

转型 **Transition Economics**

胡家勇 主笔

经济学

安徽人民出版社

转型 Transition Economics 经济学

胡家勇 主笔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道平
责任校对：曹芝兰
装帧设计：丁 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经济学/胡家勇主笔.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12-02092-3

I. 转… II. 胡… III. 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文集 IV. F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9755 号

转 型 经 济 学

胡家勇 主笔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 (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787×960 1/16 印张：27.75 字数：550 千
版 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2092-3/F·381
定 价：39.00 元
印 数：00001-03000

内 容 简 介

经济制度变迁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经济转型理论是近 10 年来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已经涌现出大批研究成果。中国是一个转型大国,选择了独特的转型之路(渐进之路),转型时间较长,也比较成功。中国学者研究转型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转型的大背景下,系统反思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并将其一般化,可以发展作为基本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经济转型的学术著作,作者多为近年来活跃在经济学研究前沿的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转型期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课题《政治经济学》,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凝结。

本书主要内容有: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中国农业制度变迁、公司治理结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转型、国有经济规模与结构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理论、政府职能转换、财政体制转型、银行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变革、基础设施领域改革、对外贸易体制转型、俄罗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理论评析等,涉及到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有清晰的分析思路,对于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理解改革的难题和政策选择,了解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等,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适合党政干部、理论工作者、高校师生、企业经营者以及其他所有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界人士学习、阅读。

主要作者简介

(以撰写章节次序排列)

- 黄少安** 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增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党国英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高明华 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杨天宇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钱 津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陈国富 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副教授
胡家勇 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蔡继明 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杰长 财政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宋清华 金融学博士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汪利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振中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曹天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 健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前言

2000年,我们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转型期政治经济学研究》,同时承担了中国社科院学科建设课题《政治经济学》,本书是这些研究活动的成果。阶段性成果包括:《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罗德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一只灵巧的手:论政府转型》,胡家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转型、发展与政府》,胡家勇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集权体制、计划经济为背景,从苏联引进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已越来越不能解释现实。相对于应用经济学(如金融学、财政学),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其发展也显得滞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政治经济学重建工作已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对如何重建政治经济学,则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是在保持原有理论框架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加进一些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迄今出版的很多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基本是这么做的。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相比,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由于基本的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没变,这种改造所带来的理论进步又是极为有限的。另一种做法是彻底打破原有理论体系,重建新的政治经济学。从总体方向上看,这种作法是科学的。因为,当资源的配置方式、居民、企业的经济行为、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乃至社会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时,作为研究社会财富增进一般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理应脱胎换骨。对于如何破旧立新,已有的尝试一般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分析方法和逻辑框架,即用西方经济学来重建我国理论经济学。应该肯定的是,在重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应该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对市场运行机理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和仔细,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从计划到市场”,市场机制被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政治经济学不深入剖析市场运行机理不行。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产生和完善的经济条件和制度背景与我国不同,如果完全照搬,同样有损于理论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例如,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私有制为背景的,私有制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产权清晰、利益明确,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经济体制转型期,如何明晰公有产权、找到公有产权真正的责任主体和有效的实现形式,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深入探讨。因

此,在重建我国政治经济学时,既要吸收中西方已有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更要面对我国的国情,以提高它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纵观经济理论的演变轨迹,探讨重大现实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充满矛盾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结构;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爆发了一场大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宏观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有效需求”、“需求管理”等概念从此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

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两点:第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第二,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政治经济学应该把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面临许多经济发展难题,如经济结构改造问题、资本积累问题、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区域经济平衡问题、贫困问题等。目前,急需探讨的发展问题有两个:一是利益分享问题,再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总量指标非常喜人,绝大多数人都从经济体制转型中得到了实惠。但是,增长利益的分享是不平等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现实挑战,社会分层加速。如何让增长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所分享,处理好公平(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是目前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可持续发展是另一个挑战。市场经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会使长期利益付出一定的代价,实现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也是一个难题。而无论是利益分享还是可持续发展,都涉及到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与限度以及二者的协调与配合,这些都必须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加以深入探讨。

经济体制转型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转型已有20多年,前苏联及中东欧地区的转型也有10多年。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为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转型理论研究是近10年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已经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例如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都提出了一些基本理论主张,比如改革初期提出了“华盛顿共识”,最近几年又对早期改革主张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转型研究一方面检验着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又发展着经济理论。转型带来了以前所没有碰到的基本理论问题,例如国有经济改革、产权明晰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政府职能转换、社会价值观演化,也凸现出诸如分权、激励、竞争、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治理结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政府职能、利益集团、寻租、制度演进等概念的分析价值。我国是一个转型大国,选择了独特的转型之路(渐进之路),转型时间较长,也比较成功。所以,中国经济学家研究转型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应该在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系统反思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并将其一般化,在此基础上发展作为基本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在转型理论研究方面,我国经济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

果,提出了诸如“双轨制”、“增量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政府职能转换”、“现代企业制度”、“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等“渐进”改革的思想。但是,对转型的研究,我们还缺乏系统性,还没有提出普遍接受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对很多问题的研究还没有上升到基本理论层次。这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应该努力的方向。本书正是这方面的尝试。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由我提出研究思路和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由各位专家分工进行专题研究,形成初稿。提供初稿的专家是:第一章:黄少安(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增刚(经济学博士生);第二章:党国英(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第三章:高明华(经济学博士后、教授),张立(研究生),徐丽(研究生);第四章:杨天宇(经济学博士后),钱津(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陈国富(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第十二章:胡家勇(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七章:蔡继明(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章:夏杰长(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第十章:宋清华(金融学博士后、教授),邓晓军(研究生);第十一章:汪利娜(研究员);第十三章:王振中(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四章:冒天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五章:陈健(经济学博士)。初稿完成后,我本着“突出主题、逻辑一致、可读性强”原则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前后历时8个月,有些章节作了较大变动。尽管如此,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学术界前辈和同行的指正。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参与研究的各位专家深表谢意,他们渊博的学识和辛勤的工作是本书的根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振中副所长既承担了专题研究任务,又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为研究活动的正常进行创造了宽松、和谐的气氛。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副所长吴太昌、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金泓对本项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安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李道平先生全力支持本书的出版,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胡家勇

2002年12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1
第一节 制度变迁理论	1
第二节 以产权变革为主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16
第三节 中国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	23
第二章 中国农业制度变迁	31
第一节 1949 年前的中国农村	31
第二节 1949 至 1978 年中国农业制度变迁	35
第三节 1978 年以后的中国农村改革	45
第四节 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与问题	54
第五节 农村经济市场化及其实现途径	57
第三章 公司治理结构	62
第一节 公司治理的一般理论	62
第二节 中国公司治理的演变	71
第三节 企业家的选择、约束与激励	86
第四章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转型	100
第一节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100
第二节 国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几种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104
第三节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109
第四节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目标模式	113
第五节 公共服务领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116
第六节 竞争性领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118
第七节 从分级管理到分级所有	120

第五章 国有经济规模与结构调整	126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功能及分布领域	126
第二节 国有经济规模:国际比较	131
第三节 中国国有经济的结构与规模	139
第四节 国有经济规模压缩与结构调整	143
第六章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152
第一节 非公有制经济迅速成长	152
第二节 个体、私营经济的贡献	155
第三节 国外中小企业发展与政府的扶持政策	162
第四节 着力营造非国有经济发展环境	170
第七章 收入分配理论	180
第一节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	180
第二节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	185
第三节 公平、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196
第八章 政府职能转换	207
第一节 经济学家论政府	207
第二节 有效政府理论	219
第三节 政府职能转换	226
第九章 中国财政体制转型	231
第一节 公共财政: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	231
第二节 财政体制的国际比较	235
第三节 中国财政体制转型	245
第四节 中国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253
第十章 银行制度改革	260
第一节 转型期中国银行制度变迁的总体考察	260
第二节 中国银行制度现状分析与评价	269
第三节 “入世”后中国银行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282
第十一章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294
第一节 社会福利产生的制度环境	294

第二节	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模式	302
第三节	社会福利的成本与效益分析	313
第四节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	319
第十二章	基础设施领域改革	332
第一节	基础设施领域的“政企合一”体制	332
第二节	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国际浪潮	336
第三节	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改革	341
第十三章	中国对外经济体制转型	355
第一节	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探索	355
第二节	强化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关税水平不断降低	358
第三节	对外贸易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362
第四节	外商市场准入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展	366
第十四章	俄罗斯经济转型分析	377
第一节	“转型”与“改革”	377
第二节	对以往研究方法的评价	378
第三节	俄罗斯经济转型及中俄转型比较	384
第四节	普京政府经济转型目标:可控制的市场经济	395
第十五章	经济转型理论评析	403
第一节	有关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的转型理论	403
第二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解释	410
第三节	对激进改革的反思	420
第四节	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426

第一章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 20 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有教训及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本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描述,对改革的经验和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第一节 制度变迁理论

近年来,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备受瞩目,许多学者把它作为分析工具,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进行解释,取得了重要成就。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丰富的制度变迁理论。本部分主要对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研究。

一、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所谓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制度结构)的过程。制度变迁是动态的,涉及到谁发动制度变迁、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变迁、如何进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效果如何等问题。相应地,制度变迁理论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方式、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等基本方面。

1. 制度变迁的主体

任何制度都是由人设计或安排的,总是以不同的规则形式存在的。即使是非正式规则,也是由人加以选择并内化到意识形态之中的。因此,制度变迁总是有主

体的。

制度变迁主体并不一定是制度变革运动,特别是大规模运动的领导者,也不一定是某种制度的直接设计者或摧毁者。只要是有意识地(如果是无意识的,则不论其是否对制度变迁产生作用,都是制度变迁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推动制度变迁或者对制度变迁施加影响者,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主体可以是政府、阶级、企业或别的组织,可以是自愿组成的或紧密或松散的团体,也可以是个人。

制度变迁只有在制度非均衡或不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制度非均衡或不稳定并不等于制度变迁。尽管决定制度非均衡的因素可能与制度变迁主体无关,但是,能够利用非均衡条件或机遇发动制度变迁的却是人,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主体一旦形成,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就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包括:认识和把握时机,确立变迁目标,选择变迁方式,制定变迁方案,实施变迁,完成和巩固变迁,最后实现新的制度均衡。这一系列的作用或任务往往并不是由一个主体或一个行动集团承担,它需要不同的主体分工共同承担。

2. 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需要动力,即制度变迁动力,可进一步区分为内动力和外动力。如果把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从理论上抽象掉,单纯考察制度变迁过程本身,可以发现,有一种内在力量在推动着制度变迁,这种力量就是制度变迁的内动力。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这种动力: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源。当现有的制度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制度就必然要发生变迁,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制度变迁的外动力指变迁主体从事变迁的直接动力,也就是制度变迁主体发动制度变迁的动因或动机。制度变迁的外动力来自变迁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制度变迁的内动力和外动力必须共同起作用,任何单独一种力量都不足以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内动力创造了通过变迁获利机会,外动力则促使主体抓住机会,实施变迁。如果没有内动力所创造的机会,制度变迁主体的利益动机再强,也没有作用点或作用场所;如果没有外动力的作用,单纯的內动力也不会使制度发生变迁,它虽然创造了“获利机会”,但没有人理会。

3. 制度变迁的方式

制度变迁的方式不是单一的,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划分:

(1)渐进式变迁与突进式变迁。所谓渐进式变迁,就是变迁过程相对平稳、没有引起较大社会震荡、新旧制度之间衔接轨迹平滑的变迁方式;突进式制度变迁,也称为“激进式变迁”或“革命式变迁”,还被比喻为“休克疗法”,是相对于渐进式变迁而言的,指在短时间内不顾现有的协调关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制度创新或进行变革的方式。

(2)主动式变迁与被动式变迁。这是从制度变迁主体的态度来划分的。主动式变迁是一些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基于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或对新制度的向往而

主动发动的变迁。但是,当一些主体对现存制度不满或希望进入新制度时,另一些主体的看法或感觉可能正好相反,它们并不存在制度变迁的利益和动力。如果一些主体已经实施并完成了制度变迁,而其他主体不得不接受这个既定事实,那么,后者就成为制度变迁的被动接受者,对他们而言,这种制度变迁就是被动式变迁。

(3)单项变迁、局部变迁与整体变迁。这是从制度变迁的范围来划分的。单项变迁指制度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层次独立于其他方面或其他层次而变革。单项变迁属于局部变迁。局部变迁不仅仅包括单项变迁,还包括多项制度共同变迁。整体变迁指特定社会范围内各种制度互相配合、协调一致的变迁。这里的“协调一致”,不是说对每项制度都做出相等程度的变革,而是强调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彼此做出应有的反应,该变则变,不该变则不变。如果不该变革的制度也被变革了,那么,这种变迁就不能称为整体变迁,而是一种逆向变化了。

4. 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

对制度变迁进行效率评价,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进行。所谓微观效率评价,就是立足于单个制度变迁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于任何一个变迁主体来说,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他所支付的代价越低,而获得的收益越多,效率就越高。而从宏观层次对制度变迁的效率进行评价,除了包括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外,还应包括对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公平度的评价。宏观层次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与微观层次不完全相同。宏观层次上的比较涉及整个社会为制度变迁所支付的总成本和获得的总收益。宏观效率之所以包括公平,这是由制度本身的功能及其与效率的关系所决定的。首先,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具有收入分配的功能。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本身就包含在效率范畴之中。有效率的制度必然是公平的。从总体上说,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只有使社会比以前更公平了,才能认为是有效率的。其次,公平与人们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从而影响人们对现存制度的认识、解释和评价。这种认识、解释和评价又反过来影响制度变迁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以及制度变迁中交易成本的大小。而交易成本构成制度变迁成本的主要方面,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效率。因此,从宏观层次上评价制度变迁的效率,就不能像微观层次那样只进行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还必须考虑社会公平。

5. 制度变迁周期

制度变迁周期指一项制度变迁的全过程,一般划分为6个阶段:(1)认识变迁条件、发现变迁机会。这是制度变迁的启动和开始阶段。(2)组织变迁集团。政府、团体都需要进行必要的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制度变迁主体。即使是单个的人,也需要经过一些组织安排,才能转化为变迁主体。(3)确定变迁目标,也就是确定新制度的目标模式。(4)设计和选择制度变迁方案。(5)实施变迁。(6)完成、检验变迁,修补、完善新制度。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比如舒尔茨、科斯、钱德勒、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诺思,都对制度变迁理论有所贡献。但相对而言,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最系统、最完备。因此,下面主要分析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体现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著作中。

1. 方法论:“经济人”假设、均衡分析、边际分析

首先,“经济人”假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并以此将制度及其变迁整合到标准经济理论之中。制度经济学有关制度变迁动力、制度变迁效率评价等,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基础之上的。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变迁主体都是财富(收入)最大化者。其次,将供求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方法用于制度分析,或者说,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框架,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又一个重要方法论特色,也是它向正统经济学靠拢的一种努力。最后,边际分析方法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起很大的作用。这里的边际分析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与均衡分析方法相联系的边际均衡和边际替代分析法。所谓制度均衡也就是某种边际均衡。诺思定义说:“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①二是空间意义上的边际分析法。在诺思看来,从空间意义上说,制度变迁往往发生在不同制度的边际上,这个边际也就是制度创新的生长点。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组合而成的制度结构中,二者的边界常常是变迁的发生点。

2. 理论基础: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

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科斯分析企业与市场两种制度的选择和替代,是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分析社会成本问题或外部损害的责任、权利划分,也是以交易费用为依据的。诺思等专门研究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家都是有意识地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分析制度变迁。他们对“交易费用”的理解和具体运用可能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依赖于对交易费用的分析来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诺思曾明确地说:“我的制度理论是由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结合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理论建立起来的。”^②

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诺思,明确接受了“博弈论”。制度变迁主体是否实施变迁,如何变迁,也可以视为一种博弈,其行为方式符合博弈论原理。制度变迁作

①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15页。

②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7页。

为一个博弈过程,关键在于参与者是合作还是背离。而合作的关键是对相关信息的掌握。如果信息完全、对称,合作就是没有障碍的。但是,参与各方都有隐藏信息和发出假信息的倾向,而且,它们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且要付出信息成本。因此,合作并不是博弈的常态。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机会主义行为”是常见的,有时明显有利的制度变迁却难以实现。

3. 制度变迁主体:广义企业家和两级行动团体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主体有政府、团体和私人。但是,这些不同的主体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从制度创新中获取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诺思把它们统称为“组织及其企业家”。这里,“组织”既是广义的,包括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又是狭义的,特指“企业性组织”。在诺思看来,政治组织也就是政治性企业,政治家就是经营政治活动的企业家。经济性组织就是经济性企业,其领导者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企业家。但是,并非全部企业家都是制度创新者。个人作为制度变迁主体,也可理解为一个单细胞组织,个人就是这个单细胞企业的企业家。企业家是制度创新的惟一主体。

戴维斯和诺思还将制度变迁主体分为“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初级行动团体,是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任何一个初级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① 它要为创新支付成本,但不一定承担全部创新成本,它必须以增加自己的收入为创新的目的。次级行动团体,也是一个决策单位,是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而进行制度变迁的团体。但是,它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制度变迁的。这种“两级划分”与“把不同主体归一为企业家”并不矛盾,因为两级主体都是诺思定义的“企业家”。

4. 制度变迁方式:渐进式为主

诺思对“渐进式变迁”与“革命式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连续性变迁”和“非连续性变迁”进行了明确定义和深入分析。他认为:“渐进的变迁是指,交易的双方(至少是交易双方中的一方)为从交易中获取某些潜在收益而再签约。”^② 渐进式变迁是连续的变迁,没有大起大落或中断,是一个演进过程,它是相对于革命式变迁或突进式变迁而言的。对于非连续变迁,诺思指出:“关于非连续性变迁,我所指的是正规规则的一种根本变迁,它常常是武力征服或革命的结果。”^③ 显然,诺思认为,渐进式变迁是连续的,而革命式变迁是非连续的。不过,诺思同时认为,革命式变迁又“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或非正式规则在特定社会

① 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71—272页。

②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20页。

③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19—120页。

的制度结构中起作用。即使发生革命性变迁,社会意识形态也不会因为革命而中断联系。非正式规则不可能发生革命式变迁,它总是连续的、演进的。一个民族的传统意识形态不会因为某次革命而被消灭、中断、取而代之,新意识形态也不会随革命成功而迅速形成。诺思再三强调:“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①,“变迁的进程主要是渐进式的”^②,“我们对这一变迁形式(指渐进式变迁——引者注)的强调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它是社会和经济已经演化的主要方式。”但是,诺思同时指出,“通过武力征服或革命所发生的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也是重要的。”^③

5. 制度变迁的动力:相对价格变化和追求制度创新收益

制度变迁的动力或原因是制度变迁的核心。新制度经济学基于微观经济学的框架来研究制度变迁,从单个制度变迁主体的行为动机或追求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制度变迁主体都是财富最大化者,它们从事制度创新,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么减少成本,要么增加收益,要么减少损失。无论政府、团体或个人,其变迁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如此。只有当制度变迁有利可图、创新比不创新更合算时,才会发动创新。如果失去了这种动机,即使存在通过创新而获利的机会,也不会有人感兴趣。诺思认为,相对价格变化是导致制度需求或制度偏好变化,从而创造创新机会的原因。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他论证了相对价格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它创造了建立更有效制度的激励,并且认为,一切制度变迁似乎都是有效的。但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中,他否定了这种绝对化的观点,认为制度变迁不一定有效。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修正产权,而这种被修正的产权却不一定能导致经济增长。其实,那些看来无效的变迁完全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微观分析方法来解释。无效率的制度变迁之所以会发生,同样是制度变迁主体为了自身利益而作出的选择,这个选择对变迁主体来说是有效的,但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却可能是无效的。

诺思将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石之一,认为培养、坚持或放弃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与制度的运行成本即交易成本有关,而且,这本身也经过了成本—收益计算。形成一种意识形态要支付代价,放弃它也要付出代价。而且,意识形态的相对价格也是可变的,也可以纳入到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之中。不过,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最终还是通过持有该意识形态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来实现的。

6. 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交易成本比较

诺思将交易成本标准应用到对制度变迁效率的评价上。首先,在他看来,无论是正式规则还是非正式规则,其变迁是否有效,都要看它是否降低了交易成本。即

①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7页。

②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11页。

③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35—136页。